

社会主义

马克斯·韦伯著

赵京译

 中日美 比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二〇〇五年二月

翻译说明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无需介绍。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已经译为中文出版。我一九八九年译完此文时没有发现中文译本，但我不能确信十六年后仍然如此。如果有其他译本，尤其是直接译自德文的译本，那么，我的译文可以对照，帮助读者理解韦伯对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议题的认识。

作为译者，不宜对韦伯的这篇短小的文章加上注解或进行总结。不过，我可以补充两点说明：1、韦伯的主要贡献不在政治思想或理论，他对社会主义思想既没有如普鲁东那样的创新的贡献，也没有如杜尔凯姆那样的专门的研究。处于他的时代，他头脑里的“社会主义”已经由前一代的政治思想巨人马克思确立，韦伯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专注于对“马克思之后”的回答、解释、批判，而不是创新。2、韦伯的这篇《社会主义》专论（另有一篇3—5页的标题为“社会主义”的短文收入在他的《经济论文集》中）不是他的研究著作，而是韦伯一九一八年六月在维也纳应邀对战败了的奥匈帝国的预备役军官团所作的演说。当然，指明上述两点，并不是抵消此文的价值。既然社会主义是攸关人类社会的如此重要的议题，了解一个伟大的社会经济学家晚年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勃兴之际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实上，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末期的衰退正说明它需要批判地吸收包括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需要克服在此文中预见到的中心困难：社会主义能避免官僚制的弊端吗？生产手段的国有化能消除支配·压迫·剥削和异化关系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官僚独裁呢？

此译本是我在大阪大学作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同时置身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性转折中，于一九八九年八月从日文版（浜岛朗译，讲谈社1980年出版）译出，间隔十六年之后，对照英文版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Peter Lassman &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72-303 修订。当我对照日、英文版译文时，发现两种译文在表述上相差不少。在两者不一致之处，都以英译为准。与其注意讲演稿表达出来的并非严密论证内容的精确性，中文译本更注重文章的思想连贯性。采取意译的另一个优点是，减少了对于特殊背景的注释说明。修订期间，得到王平等老同学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赵 京

二〇〇五年二月十七日 硅谷

目 录

1、前言

预备役的事情，三等车内的见闻，“启蒙”活动与军事权威，劳动运动的领导者和大众，军队与工会的共通点。

2、民主主义·官僚制·社会主义

什么是民主主义，直接民主主义的贵族特征，美国的民主主义，党政分离，美国劳动者的官僚概念，专职官僚的出现以及大学性质的变化，身份意识的增强，在美国的经历，普遍官僚制不可避免，工厂的官僚制，大学·研究所的官僚制，军队的官僚制，国家机关的官僚制，社会主义能回避官僚制吗？

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私有经济秩序，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历史上满足生活需要的几种企业主式的形态，城市行会的独占，工厂生产和规律，竞争·淘汰·失业，追求利润引起的合理化和机械化，物支配人，作为共同经济的社会主义，国营化和官僚统治，国家社会主义使劳动者成为奴隶，业主社会主义呢？消费者社会主义，消费能社会化吗？

4、革命的希望与失望——“共产党宣言”批判

《共产党宣言》及其预言，未来的展望，人支配人现象能消除吗？资本主义是没落的吗？贫穷化与产业预备军的理论，抛弃贫穷化理论，劳资两大阵营的分化，白领工人的增大，恐慌的预感与革命，恐慌论的谬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家的消亡，证券民主化和受益阶层的扩大，机械化带来劳动者阶级统一性的瓦解，中间层增大，标准化的影响，职员阶层的脱无产化倾向，大革命论向修正主义的变化，向现实政治靠拢。

5、社会主义路线的几个问题

政党与工会，政治主义的革命路线，经济主义的现实路线，工团主义与直接行动，同盟罢业与暴力，向现存秩序挑战，否定议会主义，敌视改良主义，谁负责生产管理？革命领导者的浪漫主义倾向，俄国的实践，怎么看无产阶级独裁的现实？一国社会主义还是世界社会主义？

6、目前状况下对革命的展望

社会主义者对革命及其结果的态度，孟什维克的立场，革命带来了什么？农民的保守性，

悲观的革命展望，社会主义者与讲和问题，讲和还是革命？与社会主义者的对立，社会主义与国民利益。

1、前言

预备役的事情

首次能对奥匈帝国军官团的各位讲话，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也稍微有点困惑，因为我对奥匈军队预备役的组织管理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而虽然是预备役，军官们对于士兵们的影响仍是决定性的重要。自然，预备役军官与民兵军官不是职业军人，他们不仅没有经过正规的士官学校的军事训练，也没法接触到组织管理内部系统的全部。

话虽如此，在我的长年的岁月中，也几度在德国各地的军队度过了不短的时光，对于将校、士官和士兵们进行过不少观察。至少我能看出：在这些那些的影响关系中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难办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当然，关于奥匈的军队，我一向无所知。当我试图理解奥匈军队的内部情况时，遇到的实际困难是奥匈帝国内有多个民族，奥匈军队里也讲多种语言。奥匈预备役军官们曾对我作过几次说明，怎么办才能与非军人保持必要的联系，并对超出服役以外的事情有影响。我自己是德国式的观念而已，那么，请允许我首先就德国军队的情况，作两、三点说明。

三等车内的见闻

当然，我的说明只是非常有限的井中之蛙式的观察。最近我经常在德国各地旅行，只要不是太长的旅途，或者我不太忙的话，总是乘三等车，这样，我就能与几百名往返于前线的士兵们在一起了。

这时，在德国军队里正好展开由军官进行的“启蒙”教育，我自然而然地从耳朵里听到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议论。虽然有少数异调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军官抱有无可怀疑的信赖感。

“启蒙”活动与军事权威

那么，问题发生于必须立即对“启蒙”活动的重大困难程度进行认识这个状况下，特别是：只要人们、士兵们对于各种直接、间接的各个政党推行的政策的意义抱有怀疑，他们通常也就不信任“启蒙”活动。士兵们一旦休假就能立即与政党人士接触，那么，对于政党人士所抱的信赖很难保持下去了。

由此产生的问题更大了，士兵们必须无条件地承认长官的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除此之外是没法设想的（当然，在德国，有时会发生在别的方面对长官进行侮辱的行为，但军事方面的权威原则上是不能怀疑的），就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感情：“我们关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和事情，是向军官请教的，但军官们仍然是处于与我们身份不同的阶层，无论怎么希望，总不能使他们与我们这些有工人、农民背景身份的人同样地思考问题。”

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用更简单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感情。“启蒙”活动如果不顺利进行，军事方面军官的丝毫不能动摇的权威是否也会被损伤呢？如果这样的话，在士兵们已经习惯了服从的

领域里，对军官权威的无条件的承认就行不通了。

劳动运动的领导者与大众

此外，过去与社会主义对立时经常发生另一种错误。站在社会民主党对立面的政党对劳动者说：“工会组织者和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在夺取工人的收入方面比资本家更甚。”不过，这种错误很早就没有人再提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劳动者都会这样回答：“的确，这些人生活在我们之间，我们付钱给他们，正是如此我们才能信任他们。他们依靠我们，必须为我们说话，这几文钱是值得支付的。”

知识阶层在各种领域造了专用语、流行语等等规定的文句，没有例外地参与各种政党活动，包括左翼政党和社会主义党的活动。如果要对这些有知识的人做出以上的这种不好听的评论的话，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依我之见，对德国工会的权利从立法等方面采取承认的态度是好事，尽管工会也存在可指责之处。对工会的这种态度，从军事上的见解看来也是明智的。

军队与工会的共通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工会也代表着一些军事组织固有的特征。你可以从你的角度看待罢工，其多数的场合是围绕利害关系、围绕工资的斗争。但却并不只是为了工资，为了精神信念的场合，例如，为了名誉的斗争也不少。劳动者们就是这样理解名誉的。

一个工厂里，同一车间的人靠荣誉感或友爱感联接起来，这种联接，虽然结果不同，却是军事组织连带的基础。正如无论是公共团体还是秘密结社都无法根绝罢工一样，从军事上看，认识到这种情况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这是事实不可改变，所以平时应该与士兵关系良好，只要士兵之间的关系不影响到军事职责，就不要干涉。依我的主观印象，德军就是这样的。

2、民主主义·官僚制·社会主义

什么是民主主义

现在回到主题吧，即你们请我来讲演的主题：社会主义的立场及其对它的态度。这个主题如果针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应该花上半年时间来讲。首先我要提出的是：“社会主义者”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些人自我命名为社会主义者，却不被任何立场的社会主义政党所承认。

所有具有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在今天全都是民主政党。让我先稍微对这个民主性质进行一点考察吧！

那么，民主在今天是什么呢？这与今天的主题相关，但也只能微微提及。民主可以有无穷多种解释，其自身只意味着不存在各个阶级间的政治权利的形式上的不平等。不过，这会产生出哪些各式各样的结果呢？

直接民主主义的贵族特征

民主主义的古老样本，可以以瑞士为例。在乌利、许瓦兹、温特瓦尔敦、阿本拆及格拉路斯这些城镇，今天也如此，由全体市民——阿本拆有一万两千人，其他城镇有三千至五千人——定期在广场上汇集，就城镇长选举以及包括新税法的各种行政问题进行讨论，然后举手以多数票决定通过。

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由这种民主方式在五、六十年内选出来的城镇长名册，就会惊奇地发现：常常载着同一人名，或者是某一特定家族的人一直占据着这个位子。也就是说：民主是法律上规定下来的条文，它的运转是贵族主义式的。当然，这个理由极为简单，任何人，如果他本身的职业不成功的话，是无法担任城镇长这样的官职的。在经济上，他必须是富裕的、往往就限于资本家阶层；如果不这样，就必须支付给他高薪和厚禄。

美国的民主主义

应该由有钱人以名誉性的职务来低廉地管理行政呢，还是由专职的领薪的官僚来高费用地管理呢？这是民主制度必须选择的方式。现代社会中，名誉职务已经不可能胜任国家管理了，而职业官僚制的产生，在大规模组织形态的现代国家中，已经成为所有现代民主制度的唯一命运了。目前的美国就是这样的状况。从理论上讲，美国的情况与瑞士相同，各州的大部分官僚，以及合众国总统，即使不是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也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平等的选举产生，合众国的其他官僚由总统任命。经验证明，这些被任命的官僚，比国民投票选出来的官僚，一般地在能力和人品上更优秀。因为总统与他的支持政党，既有选民期待的资格，更有相应的责任来任命官僚。

党政分离

美国的民主，按原则讲，总统四年一换，由他任命的三十万以上的官僚要交替，各州州长及他们任命的数千官员也应该交替。但是这样的民主已快终结了。因为由政党任命的官僚，是由于对政党忠诚才被任命为官僚的，他们专业上的能力就不被重视，什么审查、考试等等，几年之前还是美国民主所不知道的制度。与此相反，官职只不过是提供给大家来轮流作庄的生活机会而已。

美国劳动者的官僚概念

关于这一点，我曾与美国的劳动者有过几次谈话。典型的美国劳动者薪金高，也有教养。有些美国劳动者的工资比许多美国大学讲师的工资还高，他们熟悉市民社会的风俗，戴着高筒形礼帽，伴着夫人。其夫人，看起来在才气和贤惠方面稍欠不够，不过其举止并不逊于别的贵妇人，只不过是欧洲移民过来的，属于下层阶级。

我与这些美国劳动者同席时问道：“你们怎么能让那些家伙从政呢？那些官职是你们提供的，但他们的官位却是由政党任命的，他们必须以某种形式把薪金上贡给政党。而且，他们的任期只有四年，期满必须辞职，所以他们在任职期内定会贪得无厌地赚钱。你们怎能白白地把几亿美元交给这些腐败之徒让他们去从政呢？”

这种场合，我总是得到美国式的回答。这个回答表现得满不在乎：“这算什么？想要偷盗，钱是有的，然而别的人——象我们这样的人，要赚钱是有门路的。无论是政客还是官员，算什么玩艺儿，被人瞧不起的。不过，象你们那样，有学问的人要通过什么考试才能当官，岂不把我们当傻瓜了吗？”

这个回答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是说到点子上了，对欧洲这样的经过大学专门训练的有身份的官僚阶层的出现，他们心里是害怕的。

专职官僚的出现以及大学性质的变化

即使在美国，很早以前，凡人从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专职官僚制度很迅速地普及，实施了职业考试。当然，这还停留在形式上，特别是在某些技术官僚的选择上；但这种实践却是很急速地在普及。由总统任命的官僚中，现在已经有十万人左右必须通过考试，合格才能被任命，旧民主制度已经迈出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并开始转变。

与此相应的是美国大学也开始扮演崭新的角色，大学精神风貌也为之一新。结果是：发动战争的已经不再是从战争中赚钱的商人，而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人了。在美国之外，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一九〇四年我去美国，美国大学生最关心的是：在德国到底决斗是怎么定下来的？怎样在剑术训练中刺下伤疤？美国大学生认为决斗是骑士风俗，是值得学习的体育活动。

身份意识的增强

最重要的是，特别在我的研究领域，专业写作也迎合了这种风潮。我读到当今最精彩的文章结尾是这样记载的：“当靠战争剥夺别的世界贸易而获利（变成健全的实业观）值得推行时，幸好世界经济发生推移。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美国人只顾赚钱不讲道义的时代宣告结束，我们将再次迎接尚武精神和骑士道义的世界的到来。”

他们可能想象现代战争如在冯特挪（注1）会战中那样，法国的传令兵向敌方叫道：“英国绅士们，请先开枪吧！”法国人对近代战争就是这样看的，战争就是眼前的一种骑士般的运动，这种运动，比起追求利润的商业活动，有一种身份高贵的感情意识。

美国的经历

据我所知，以这样的“种姓”形式看待美国，正如德国对美国的各种评估一样，已经自有定论。

政治家即从这样的种姓阶层中产生出。这次大战的结果，美国将变为拥有庞大军队、军官团和官僚的国家。不可能期待这样的军官会同情美国的民主制度。我当时曾与他们交谈过。有一次，我到一位同事的女儿家去，正好那时佣人放假了——在那里，佣人也是有两小时的休假时间的。她的两个海军士官候补生儿子正好回到家中，母亲就说：“你们到外头去把雪扫了，否则每天会被罚款 100 美元。”两个儿子正好与德国海军士官一起，认为这种事不该由他们干。他们的母亲又说：“你们要不干，只好由我干。”

普遍官僚制的不可避免

这次战争对美国来讲，促使了官僚制的发达，也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升进的机会。在人们说“欧洲美国化”的同时，战争也使美国很快地欧化了。近代的大国的民主制度，无论何处都是官僚化的民主制度，非此不可。

这样，高贵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名誉官职就被官僚阶层取代了。这是无论何处都发生的过程，政党内部的运行也是这样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长年累月的专业训练，不断发达的职能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受过专门教育的官僚阶层进行管理的必要性，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首要事实。近代经济的管理方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途径。

工厂的官僚制

特别是，普遍官僚化的不可避免性，很准确地表达在常常被引用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这个社会主义口号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劳动者被从他们所用于生产的手段中分离出来，劳动者变成了工资奴隶。对比中世纪的场合，劳动者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他们以此进行生产。而近代劳动者，不可能拥有生产工具。他们干活的矿山和工厂的经营权不论是为资本家还是为国家所有，都不是他们的。近一步，考虑一下以下的情形：过去的手工业者自己买进加工原料，而现在的工资劳动者却不这样，也不可能这样；与此相应，过去和现在的手工业者可以保持自己的产品，各自处理自己的产品，卖到市场上去以用于自身的需要；而在现在的大企业中，产品的处分权不在劳动者手中，而在资本家或国家的经营者手中。

大学·研究所的官僚制

的确如此，而且这并不只是经济生产过程中特有的事实。例如大学内部的情况，也是与此相同的。过去的大学讲师或教授自己买图书或设备进行工作，例如化学教师就自己制作教学的必要设备。与此相比，近代大学组织中的雇员，例如大研究所的助手，与普通劳动者处于完全相同的状态下。他们随时都有被解职的可能，他们在研究所里所有的权利，与工人在工厂所有的权利没有区别。他们必须象工人那样服从现行的操作程序。化学或物理研究所、解剖研究室以及附属医院所用的材料、仪器、设备等等，都不为他们所有，而是国有财产。他们由研究所所长管

理，只是按劳取酬，而且他们的收入的计算方法在本质上与熟练劳动者没有两样。

军队的官僚制

军队领域的情况也与此完全相同。过去的骑士是马匹、盔甲的所有者，他们的给养和武装必须自备。当时的军事制度遵循装备自理的原则。在古代都市和中世纪骑士军中，人们必须自备枪盾、马匹、自带粮草。近代军队的成立始于诸侯供应给养，这个瞬间，兵士和军官再也不是战争管理手段的所有者了（军官与别的官僚有一些不同，但他们都一致服从自己的上司）。近代军队就是靠这一点组织起来的。

俄国兵士很长时间内不敢从散兵壕上逃跑，也是基于这一点。他们心中明白：因为有这些军官团、给养部以及其他官僚机构的存在，军队每个人的存在与给养部与这些机构的功能息息相关。如同劳动者被从劳动手段中分离出来一样，他们也被从进行战争的手段中分离出来了。

国家机关的官僚制

封建时代的官僚，即授予行政权和裁判权的诸侯，与骑士处于完全相同的状态。他们自己支付行政和裁判的费用，在行政和裁判的过程中取得报酬。这样，他们就拥有行政运行的手段。当君主把这一切归于自己的家政、雇佣领薪的官僚、把官僚从经营手段中分离出来时，近代国家也就出现了。

社会主义能回避官僚制吗？

这样，无论何处事情都一样，在工厂、国家机关、军队以及大学研究所内部，都存在着官僚体制编成的机构，靠这些机构，经营手段被集中在统治这些机构的人的手中。这一部分是由纯技术性的如机械、大炮等近代运行手段的特性而来的，另一部分是因为从军队、官厅、工厂以及经营的“规律”中发展出来的更有效的人际合作关系。

无论怎样，劳动者从经营手段中的分离，如果只以为是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本身固有的现象，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可以换一个机构的首长，例如把私有制的企业主换成国家的总统或大臣来管理，事情的性质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论什么样的场合，从经营手段中分离开来的现象依然存在。中世纪手工业经营手段或者在各个行会主手中，或是在地域行会手中，但今天的矿山、熔炉、铁道、工厂及机器绝不是各个或多个劳动者的财产。现代技术的性质决定了这一点。

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私有经济秩序

我们来看：社会主义到底与此有什么相关？前已提及，社会主义有各种意义。然而一般地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就是私有经济秩序。私有经济就是：经济的必需品的供给由私有企业的

资本家负责，资本家采取合同、工资契约的方式来调节经营手段、职员及工人的物质分配，自己负担经济风险，生产认为可以带来利润的产品并把它们卖到市场上去。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社会主义理论把这种私有经济状态贴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标签。因为在私有经济下，每个企业主只关心自己产品的销路，只关心能否赚钱，而不管如何保证生产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历史上满足生活需要的几种企业主式的形态

就一个社会内部，到底是企业主式即私有经济式还是社会主义式即计划性组织方式来满足社会需要，在历史上有许多变化。

举例来看，中世纪意大利境内的小公国基诺亚式的共和国，用海盗式“毛纳团”即有限合伙股份形式，对塞浦路斯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战争。毛纳团汇集必要的资金，雇用军队，在共和国的保护下征服领土，当然也为此目的榨取该领土，使之成为殖民地或征税对象。同样，东印度公司也是为了英国的利益将印度征服并为了自己的利益榨取印度。

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佣兵队长，也属于同样类型。佣兵队长就象其最后的代表瓦轮斯坦（注2）一样，以自己的名义、自己的资产募集军队，瓜分一部分战掠品。当然，他有时与一些君主或国王勾结，让他们对于他的行为提供一些经费，补偿他的损失。

与佣兵队长相比，自主性稍逊一些的十八世纪的连队长也是自己招集新兵、支給衣食的企业主。当然，他们也部分地依赖于君主的储备，但在相当程度上自己负担危险、自己享受利益。虽然今天看来有些异常，这样把战争的进行作为私有经济的经营，那时却是极为普遍的事情。

都市行会的独占

另一方面，中世纪都市食物的供应，或行会主们不可缺少的原材料的供应，只是简单地由自由贸易来进行，是不可思议的。相反，从古代到中世纪，都由都市在为此操心（古罗马的规模之大更是如此），自由贸易只是都市的一种补足。与今天的战争经济时代大致相同，大规模经济部门之间，如今天的“联合国营经济管理”模式，存在着共同合作。

工厂生产和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私有经济与私有官僚体制结合，加上劳动者与经营手段相分离，在工业生产中占有前所未有的支配地位。其过程伴随着工厂内机械化的进行、同一场所工人的聚积、工人被束缚在机器上、以及共同的劳动纪律。今天把劳动者从劳动手段中分离出来的特色就在于纪律。也正是从这样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工厂纪律中产生了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随时随地、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各式各样的形式，而社会主义的近代特征就是基于这种基础之上的。

竞争·淘汰·失业

对劳动纪律的服从，就工人而言比奴隶和赋役农奴更甚的是：近代的产业经营是基于激烈的淘汰过程的。今天的企业主并不因为劳动力工资便宜就愿意随便雇佣任何工人。他出一定的工资，把工人叫到机器旁，说：“好，请干一下，看能干什么。”如果这个工人连企业主愿意支付最低工资的能力都达不到，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非常遗憾，你不合适这个工作，没法聘请你。”这个工人就不能找到工作。在没有找到充分熟练利用机器的工人之前，机器就不能被充分利用。这是随处都经常发生的。古代的奴隶经营，奴隶主把奴隶束缚起来，奴隶的死是奴隶主资产的损失。与此相反，近代工业经营是基于淘汰原理的。另外，这种淘汰在业主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竞争使各个业主定出一定的最高工资来。工人工资就是对应于纪律不可避免地确定的。

追求利润而引起的合理化和机械化

如果工人跑到业主那里要求到：“这个工资没法活下去，不可能再提高一点吗？”此时，在和平时期激烈竞争的产业里，业主十有八九会向工人打开账本指出：“不能，竞争对方是如何如何地支付工资的。如果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工资，就会把本来可以付给股东的赢利用完。如果从银行连一文贷款也拿不到，经营还能持续下去吗？”他这样回答，通常是实情。

最后还想指出的一点是：在激烈的竞争下，为了增大利润，必定要用新机器来减少劳动力，解雇工人，特别是那些领取高工资的工人。这样就不得不雇用非熟练工人或直接从事机械操作的“见习工人”取代熟练工人。这是不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过程。

物支配人

所有以上的情况，社会主义认为是物对人的支配，也就是手段对目的（满足需要）的支配；过去，除了“被保护者”（注3）、农奴及奴隶，人们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现在已经不可能存在了。社会主义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生产秩序做出这般批判的。经过科学训练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把劳动者的不幸境遇的责任推给单个的资本家的作法，都是反对的。他会说，罪过就在这个制度，资本家、劳动者以及所有的关系者都被置于这个强制状态之下。

作为共同经济的社会主义

那么，作为这种制度的对立面，社会主义的积极面是什么呢？从广义的意义上讲，这就是所谓的“共同经济”。第一，这是没有利润的经济，这种状态下经营者没有指导生产的责任和风险，如下所提，对这个经济的管理交到了人民社团的官僚手中。第二，消除了所谓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即消除了业主之间的相互竞争。目前，由于战争的影响，许多德国人认为这种“共同经济”很频繁地存在着。考虑到这一点，我想简短地论述一下，任何民族组织的经济组合方式，

可以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则。

国营化和官僚统治

第一是联合国营管理形式，参加过战争产业的人对此都毫不生疏。这种形式在某一产业内基于无论是作为文官还是武官的国家官僚与业主阶层的协作，它在很大程度上有计划地规定原料供给、信用调节、价格及各种关系，国家也可以参与这种组织（注 4）的决算分红与决议。有人会认为这样一来，业主被政府官僚所监督，生产被国家所管理安排，这正是真的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者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吧！

实际上的产业统治国家

不过，在德国，对于这种理论却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战争中怎么样暂且不问，稍有思考的人都会明白：如果我们不被灭亡，和平时期的经济不可能继续维持这样的国家管理。在平时，这样的国营化，即各行业的卡特尔化，以及放弃了控制权而进行利益分配的这种国家对卡特尔的参与，实际不是由国家统治产业，而是由产业统治国家。当然，这是非常不幸的方式。

在卡特尔内，国家的代表者与业主开会时，业主在专业知识、商业训练及维护自己利益的决心上都比国家的代表者优越得多。在议会里，劳动者代表也参加进来，就使得国家代表必须为高工资、低价格着想。他们会要求把这种权力交给国家代表。另一方面，国家当然不愿意承担因这样的辛迪加的利润损失带来的财政赤字，它自然希望高价格低工资。最后，辛迪加的私营者们当然期待国家保证他们的利润。

国家社会主义使劳动者成为奴隶

这样，这种国家在劳动者阶级的眼里，就成了货真价实的阶级国家了。这在政治上是否好我是怀疑的。尽管存在着各种企图，我对于把这种国家事物描绘成“本来的”、“真的”社会主义，的确感到迷惑。

对于劳动者而言，他们只是经历了这样的事实：在矿山劳动的人的命运，并不因为这个矿山是私营还是国营而有丝毫改变。在萨耳炭矿，劳动者的生活与矿山私营完全一样，如果管理不善，收益不好，劳动者的状态照样恶化。不同的是：不能对国家进行罢工；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只是使劳动者的奴隶属性更加严重罢了。

业主社会主义呢？

社会民主党对于这样的经济国营化，对于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普遍反对的理由即在于此。这是一种卡特尔式的共同体。关键还是在于利润。在卡特尔里，国家财务已经合并为一，那些单独的企业主如何考虑对于利润的追求，依然是重要的。

今天，政府官僚层与私有经济的官僚层（卡特尔、银行、巨型企业）作为不同的团体分立并存，由政治权力可以统制经济权力。但这两个阶层将成为利害关系一致的单一团体，就不可实行管理和统制了。无论如何，无法取消利润这个生产的航标。目前状态下的国家只好忍受着工人对业主的憎恨。

消费能社会化吗？

上述业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极端反面就只能是一种消费者组织，它将关心国家经济会满足什么样的需求。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特别是在比利时，有许多消费组织设立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如果这样的原则被扩展到国家机构的手中，这将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消费式社会主义。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它的领导会如何产生，也不清楚什么样的利益团体能够出现。事实已经证明消费者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领域里组织活动。

当能够实现利润或保证有收益时，人们为了特定的商业利益很容易组织在一起。“联合国营化”的方式就可能实现一种“业主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把那些除了买东西、忙生活以外没有共同特性的人组合起来是极端困难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消费者的整体状况成为社会化的障碍。至少目前在德国，尽管食品不足，多数的家庭主妇并不愿意接受大量生产价格便宜的公共食堂，而宁愿在自己家里烹煮食物。

4、革命的希望与失望——“共产党宣言”批判

《共产党宣言》及其预言

前面就讲这些，最后让我们看一下社会主义的实质吧！今天存在的社会主义大众政党，即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与社会主义相连接的。而社会主义的基础文献是 1847 年写成、1848 年由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不管我们怎样否定其基本思想（至少，我是否定它的），这个文献的学术质量是第一流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也不必否认。谁也不可能不承认这一点，也不可能背着良心去否认它。既使在我们拒绝的基本思想中，也有丰富了我们思维的谬误。从政治上讲，这些谬误带来了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但它在学术上带来了丰硕的成果，这种成果，常常比平庸的正确还丰富多彩。

对《共产党宣言》，首先要讲一点，尽管并不一定是在文章中，而是从词义中表露出来的，就是对道貌岸然者的批判。《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至少从他们的主张看来，虽然没有对社会的庸俗低劣进行猛烈非难，但他们实际上是热情奔放有时并不抑制自己感情的人。

未来的展望

他们不是把考察人世怎样组织、以及人世应该如何组织作为他们的任务。相反，《共产党宣言》是预言的文献，它预言了社会的私有经济即常说的资本主义组织形态的没落，预言其将被作为

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独裁（注 4）社会所代替。

然而，在这个过渡状态之外，存在着通过消灭人支配人制度而达到无产阶级从奴隶状态实现自我解放这个无产阶级固有的最终期待的目标。这是《宣言》的预言与中心命题，没有这个命题，就没有这个宣言，就没有这个宣言所造成的巨大历史影响。如何实现这个预言呢？宣言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即劳动者大众通过自己的领导者掌握政治权力。这个过渡状态将进化到历史发展的最终阶段：“自由个人的联合体”。

人支配人现象能消除吗？

这个联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一点《共产党宣言》秘而不语，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都对此闭而不谈。我们只知道，谁也不知道这一点，能说的只是：现代社会在没落，这是由自然法则引起的，并将首先导致无产阶级独裁。对于那个随即而来的社会，除了预言它消除了人支配人之外，什么也没有讲。

资本主义是没落的吗？

现代社会按照自然法则不可避免的没落，有什么样的理由呢？激昂的预言的第二个中心命题说这是严格地按自然法则发生的。这个命题是由使大众充满欢心的信仰引出的预言。恩格斯曾经这样比喻：正如地球这颗行星最终要被太阳吸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注定要没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理由呢？

贫穷化与产业预备军的理论

第一点，以业主为首的以及与业主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人组成的资产阶级支配阶级，只有在至少能保证被支配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下，才能维持这种支配。

作者们认为奴隶制度正是基于赋役农场制度才能存在。因为它保证了人们最起码的生存，支配得以维持下来。但是，近代的资产阶级却做不到这一点。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为了提供更便宜的商品，必须不断更新机器，使得劳动者越加没有工作，从而使得这种统治不可能维持。资产阶级必须有可以随时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处置的广泛的失业者阶层即“产业预备军”，资本家从这个阶层中随时都可以挑出他们需要的适合于经营的劳动者的数字，产业的机械化不断增大这个阶层。《共产党宣言》认为：这样的结果，产生了不断增大的永久性失业者即“贫民”阶级，降低最低生活费，无产阶级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下连最起码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如此一来，社会的不安定积累到某种程度，在革命爆发时将使社会发生崩溃。

抛弃贫穷化理论

“贫穷化理论”的这种形式今天已经被所有部门的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不正确的东西无一例外地

抛弃了。《共产党宣言》纪念版的编者卡尔·考茨基（注 5）明确地指出历史发展不是沿这个道路而是沿别的道路进行的。《共产党宣言》的中心思想已经被重新注解而坚持下来。要补充的是，虽然不是没有疑问，抹掉了过去的那种凄楚的性格。然而，无论怎样，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基于什么呢？难道不可能不断失败吗？

劳资两大阵营的分化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第二个论点：即，业主之间的竞争，意味着资本或经营能力，特别是资本方面的强者胜利、弱者被排挤掉，业主的数目不断减少。随着业主数目的不断减少，无产阶级的数目就相对地、绝对地增大起来。

到了某个时刻，资本家数目减少的结果，使他们不能够维持统治了。这个时候，这个雇佣别人的“没收者”就被平和地、非常得体地（可以说还拿着终身年金）没收了。因为他们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寡不敌众，没法维持这种统治了。

白领工人的增大

这个命题，至今仍然以被修正过的形式坚持着。但是，这个命题在今天，无论以什么形式，一般来讲都是不正确的。首先，它对农业是不合适的，（作为业主的自耕）农民层显著增大的情况随处可见。而且，它即使对于大规模产业部门来讲不能说不合适，其结果却是与预想不同的。事实上，在这些产业部门中，资本家数字不断减少的简单事实本身并没有象《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发生。实际上，对弱小资本家的排挤的结果，是使他们被吞并到金融资本、卡特尔或特拉斯形式中去了。

但是，这个错综复杂过程的一个附随现象是：私有经济官僚制度下的“职员”数量迅速增大。统计数字显示他们的增长远大于工人的增长。他们的利害关心，并不是无产阶级独裁。这样，产生出来的千差万别的利害关心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与资本主义秩序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人的实数和势力是不可能不断减少的。无论如何，那种几人、几百人或几千人的大资本家孤立地与几百万、几千万无产阶级对峙的截然两分的事态是不会出现的（注 6）。

恐慌的预感与革命

最后，就是对于恐慌影响的推断。因为业主彼此之间竞争，就会反复出现生产过剩时期，破产、倒闭以及所谓的“萧条”交替发生。经典的社会主义文献中，认真地专门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这里就割爱不论了。

虽然《共产党宣言》只是暗示这个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但后来却被赋与了特别的理论说明。一百年来，这种恐慌基本上有一定的周期性。这个原因是什么，连一流的专家学者都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今天就不提它了。

不过，经典的社会主义却把希望托附在这个恐慌上。特别是，这个恐慌按照自然法则不断增强，同时也积累增大了引起暴力革命的破坏与不安的气氛，到某个时候，连无产阶级之外的人也不可能再继续维持这个经济秩序了。

恐慌论的谬误

这样的希望今天已经被彻底放弃了。因为虽然恐慌的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其相对的意义却减少了。业主之间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已经朝着卡特尔的方式变换，制定价格和销路使竞争消除了不少。而且，象德意志国家银行这样的大银行，通过信贷业务，使过剩投机比原来减弱不少。《共产党宣言》及其后继者们所抱的这个最后希望，既使没有被驳倒，其前提也已被极大地改变了。

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家的消亡

这样，《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崩溃所抱的非常凄楚的希望已经被更加谨慎的期待取代了。在这种谨慎的期待中，首先，随着经济生产的社会化，产生了社会主义可能进化而成的理论。这种场合，意味着雇佣经理的股份公司代替了个别资本家的单独经营，经济运营不是基于原来那样的由个别人或个别私营企业主承担风险和享有利润的私有制经营，而是基于由国家、当地政府或某种单一目的团体的经营。这种情况是真的，但是股份公司的背后是一个或多个金融资本家，他们在股东总会上占据关键地位，执股东之牛耳。

证券民主化和受益阶层的扩大

股东都知道，在股东年会之前他总会收到银行要他去投票的通知，如果他不想出席股东年会投票的话，他可以委让银行去。面对几百万克郎的大资本股东，他的投票几乎是毫无价值的。不过，这样的社会化，一方面增加了官僚阶层、受过商业或技术专门教育的职员的人数；另一方面，增加了不从事业主那样的精神劳动、只靠利益分配和利润生活的、其所得与资本主义秩序相关的寄生阶层的人数。

在公家经营和单一目的团体经营中，占优势的**不是劳动者，而只能是官僚**。劳动者此时更难采取如同对私营资本家采取的罢工那样的形式。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正在进行的**不是工人的独裁而是官僚的独裁**。

机械化带来劳动者阶级统一性的瓦解

第二点，是指以下的希望。正如机器促进了旧时的专门业阶层、熟练手工业者、原英国工会的熟练劳动者被非熟练劳动者取代一样，让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机器边工作，就消除了原来那种由职业不同带来的分裂，使劳动者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意识非常之强烈，会在与有产阶级的斗争中发挥作用。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完全一致。真正的情况是：正是机器本身不断换掉了许多高薪的熟练劳动者来，每个产业都不断地导入机器换掉不易找到的劳动者。现代产业内部最迅速增加的阶层是所谓“半熟练”劳动者，他们不是原来那种经过特殊职业训练的劳动者，而是直接被配置在机器旁边见习边干活的劳动者。而且，见习劳动者一般都必须达到相当高的技能才行。例如见习纺织工必须经过数年训练才能达到最大限度的熟练程度从而把业主的机器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并使自己领到最高工资。其他产业劳动者的典型的正常见习时间比这种场合要短得多。

中间层（产业下士官）的增大

无论怎样，见习劳动者的增加带来了专门化业者的衰退，但并不意味着消除了职业专门化。另一方面，随着职业专门化和专门训练的必要性的增大，产生了车间主任或生产组长这样的立于劳动者阶层之上的内部生产阶层，属于这个阶层的人数是相对增大的。

不错，他们确实是所谓的“工资奴隶”，但他们的工资一般不是临时的按件记酬的，而是固定的。特别地，比起工厂主，劳动者更恨强制他们的工头；比起实际上不劳而获的股东，劳动者更恨工厂主；尽管工厂主必须进行非常艰苦的精神劳动，工头实际上与劳动者的关系更靠近一些。这样的情况，在军队中也如此。依我所见，下士官是最可能也是最被士兵们反感的。无论怎样，阶层化整体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化。

标准化的影响

最后想谈一下标准化的增大即生产的统一化问题。随处可以看到产品的单一性、可交换性的增大和业务规格化的广泛推行——战争特别促进了这一切。可以说，除了最上层的资本家，过去那种市民企业主奔放的开拓精神已不复存在；上层资本家的这种精神也处在不断衰退之中。结果是，不具备在一个资本家社会必须具有的特殊经营资格也能经营生产的可能性增大了。在取代了个别业主拥有庞大职员的爱特和托拉斯，更是如此。标准化的结果也使得官僚阶层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职员层的脱无产阶级化倾向

这个官僚阶层必须受一定方式的教育，而且加一条，必定会带有一定的身份性质。这就是为什么商科学校、实业学校、工业专门学校不断地产生出来。如此，至少在德国，就有了这样的希望：在学校加入学生社团、在脸上刺下刀痕、具有申请决斗资格、取得预备役资格、以后在私营事务所工作时向有上司的女儿求婚的优先权，进而同化到所谓“上流社会”阶层中去。

这个阶层不愿与无产阶级联系，只想与无产阶级越离越远。这种情况，对于下层的大多数职员来讲，程度虽然有所不同，也是适合的。所有的人，或是为了自己的地位，或是为了后代，都多少地为取得类似的身份而处心积虑。根本没法看出朝着无产阶级化发展的明确倾向。

大革命论向修正主义的变化

即使如此，这种论调也发生了变化，赋予《共产党宣言》中魅力与威力的大灾难爆发的革命希望让位于渐进主义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许多资本家竞争的旧经济制度被国家官僚管制起来，或者由有官僚参与的卡特尔管制起来，逐渐变成一种制约经济。这不是由于竞争和恐慌而结为一体的个人主义企业，而是演变成不存在人支配人的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

这种渐进主义的期待缓慢地变化为社会主义未来的气氛，在战前就代替旧的大灾难论而出现于工会和社会主义者的多数知识分子中了。这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所谓“修正主义”。旧的基督教信仰相信突然造访的幸福到来，正如传福音者告诉大众的那样，今夜就能得救。而修正主义的领袖们多少意识到一旦民众抛弃这种基督教式的对社会主义突然降临的信仰，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完全有可能抛弃《共产党宣言》及此后的大灾难爆发论的信条，只不过这种场合很难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与基督教徒由于对正统信仰怀疑而产生论争一样，修正主义与正统社会主义的论争，也经历了很长的发展历程。

向现实政治靠拢

这个论争，涉及到以下问题：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到底应该不应该参与“现实政治”？多大程度参与现实政治？要参加的话，就得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争取大臣地位参加有实际职权的政治领导，努力改善劳动者目前的生活状态。这样做，自然地，在那些固执于大灾难爆发论的正统社会主义看来，毫无疑问地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的政治异端了。

这样一来就发生了原则上的问题，导致领导者之间意见分歧。由渐进的进化带来全盘的卡特尔化、标准化和官僚制化，使得经济体制发展到这种程度，在技术上兴许能改变现在的私有经济制度以及对生产资料的私有而完全消灭资本家。不过，这种场合下指挥新经济体制的是什么人呢？这一点《共产党宣言》或是严守沉默，或是非常暧昧。

5、社会主义的路线上的几个问题

政党与工会

《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自由个人的联合体”到底有什么样的性格呢？为了想象社会主义一旦夺取了政权为所欲为的场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组织的萌芽形态能给我们提示什么。就德国和其他任何地方而言，社会主义有两种形态的组织。

第一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有议员、专任编辑、党的官僚和雇佣他们的下属，以及中央、地方的组织，由这些组织选出或任命这些人。第二是工会。这两种组织都有它们的革命的性质，也有它们的渐进主义的性质。关于组织应该有什么样的性质，将来应该如何发展等等，大家意见相左。

政治主义的革命路线

从革命的希望出发，有两种对立的见解。第一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共产党宣言》的旧传统，把所有期待托付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独裁上，并且不可避免的把这个历史责任放在为了选举即临时拼凑起来的政党上面。相信党和以党为支柱的政治独裁者应该夺取政权，由此产生新的社会组织。

经济主义的现实路线

有两种人反对此革命论立场。第一是象过去英国工会那样的工会组织，认为革命的前途遥远无限，所以干脆不关心这样的计划。他们首先为了可能的生存，在自己及子弟的劳动条件即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实行劳动保护等等方面进行斗争。

过激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反对这种工联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对于议会主义道路的妥协政策，即自从米勒兰（注7）参加法国内阁以来被称为“米勒兰主义”的议会道路派社会主义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因为这样一来，革命的领导者更关心大臣的职位，下层的组织者则为了获得各层官僚的地位而费心，完全丧失了革命精神。

工团主义与直接行动

最近几十年间，在旧有的“激进”和“正统”路线中，加入了一般被称为“工团主义”的新潮流（Syndicat 在法语中是“工会”的意思）。就象过去的激进主义把政党组织的目的解释为革命一样，工团主义也把工会解释为革命的手段。它的出发点是，在革命到来的那一瞬间，掌握经济权力而“直接行动”的，不是政治的独裁和独裁者，也不是被政治指导者任命的官僚，而必须是工会及其联盟。工团主义基于严格的工会运动的阶级立场，认为只有劳动者阶级才是终极解放的主体。

那些逛荡在首都的、脑子想的是这样那样的内阁怎么样了、这样那样的议会中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机会的政治家，都被政治的利害关系所俘虏而不是阶级同志。他们在选举区利益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为票数奔忙的编集和私人雇员的利益。

工团主义拒绝近代议会主义选举制度的所有利害得失，认为只有组织在工会中的真的劳动者才能创造新社会。必须远离那些为了政治（实际上是靠政治生存而不是为了创造新的经济社会）而生存的政治家。

同盟罢业与暴动

工团主义者代表的手段是同盟罢业和暴动。他们对同盟罢业寄予的失望是：使全部生产瘫痪，使相关者特别是资本家放弃自己管理工厂的念头，把权力委让给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委员会手中。

有一些人公然声称、有一些人秘密实行、有一些人拒绝暴力。虽然意见相左，他们的组织会对上层决策阶层施以暴力，使其在政治上也陷入瘫痪。

向现存秩序挑战

不用提，这种工团主义是强烈反对所有军队组织的社会主义。因为各种军队组织制造出下至士官生的利害关系者。至少在目前状态下，甚至普通士兵的生活也依存于国家机构与军队机关。这样，一部分人对于罢业的失败持关心态度，至少是同盟罢业的障碍。

否定议会主义

工团主义的首要敌人是在议会中活动的一切社会主义政党。议会能够成为工团主义者振振有词的讲坛吧！他们可以喋喋不休地利用国会议员的不可侵犯权告知同盟罢业的到来及其必然性，而为大众的革命热情煽风点火。但是工团主义认为这样也不行，会脱离本来的革命使命。在议会里从事政治，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应该被拒绝。

敌视改良主义

当然，各种渐进主义者也是他们的敌人。有的工会认为应该只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但工团主义者会说：工资越低、劳动时间越长、工作条件越恶化，同盟罢业的机会就越大。另外，政党路线的渐进主义者会说：今日的国家，可以通过不断增强民主而达到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者对民主极度嫌恶，他们认为沙皇的制度更好一些，改良主义至多只是自我欺瞒而已。

谁负责生活管理？

关键的问题是：工团主义有什么力量来从事生活管理呢？因为即使经过各种训练、长年从事工作、对劳动条件了解得很详细的工会成员，也不可能懂得工厂的经营。无论什么样的近代工厂，从头到尾都依存于计算、商业知识、供求状况的分析、技术训练等等，这些东西专业化都很强，作为劳动者一员的工会成员，实际上完全没有机会学到这些知识。这样一来，他们就特别需要非劳动者的知识阶层出身的理论家了。这样，解放就不是信条所说的那样只能来自团结在工会同盟下的真的劳动者而不能来自政治家这样的局外者。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大战之前作为工团主义运动主力的法国和意大利存在大量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情况。

革命指导者的浪漫主义倾向

这些人在工团主义中追求的是什么呢？正是同盟罢业的浪漫倾向以及对革命的期待产生的浪漫倾向本身魅惑了知识分子。仔细观察这些人，他们都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在精神上不能忍耐普通人的生活和需求，或者干脆嫌恶这些东西，而渴望和追求伟大的革命奇迹和某一天到来的权

力机会。当然，他们中间有的人有组织能力。问题在于劳动者阶层会服从他们吗？的确，战争爆发时，伴随着不易想象的变革，劳动者阶级出于共同的命运，特别在饥饿的驱使下，非常容易追随工团主义的主张。也有可能拿起武器在知识分子领导下夺取政权。当国家的政治军事秩序的崩溃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时，我对于工会成员和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在和平时期的生产管理能力的怀疑态度是抱怀疑态度的。

俄国的实践

目前，在俄国正进行着伟大的实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能越过边境去看俄国的实际生产管理状况。从道听途说的消息中，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政府中有在本地的维也纳和德国学习过的知识分子，也有少量的俄国知识分子。从社会民主党的情报中得知，目前仍然在运行的相当于和平时期的生产能力的 10% 的工厂，重新开始实行产品计件工资制度，因为不这样做工作效率会降低下来。布尔什维克把企业家供为上宾，给予高级工资，因为他们才拥有专业知识。

并且，这个政权又开始对原来的官员支付薪水了，因为它理解自己需要军队，而必须有老练的军官来指挥。这些军官控制了军队后还甘心于受知识分子的指挥吗？我是抱有疑问的。当然他们现在必须这样做不可。布尔什维克政权靠食品供应卡强制官僚阶层为他们效劳。但是，这种方式不能长期地用于国家管理和经济运行，目前为止还看不出这种实验有什么希望。

怎么看无产阶级独裁的现实？

值得惊叹的是这个组织至今还在运行着。这是因为这个组织即使不是将官也是下士在实行军事独裁；因为从前线复员的疲劳士兵与想要土地、惯于农业共产制的农民合流；或者是因为兵士抢夺村落，征收税赋并杀害任何反抗者。这就是目前为止“无产阶级独裁”的唯一大规模实践。布勒斯特和约，德国方面是非常诚实地做的，我们诚直地希望与这些人达到真正的和平。这是有许多理由的，与资产阶级社会利害相关的人，赞成让他们从事他们的实践，让失败成为一个好样本。我们中别的一些人也赞成：“如果这个实践成功了，又判明在这个土壤之上可以培育出文化来的话，那么我们就改宗也行呀。”

一国社会主义还是世界社会主义

但却钻出个托洛茨基的人物。他不满足于只在本国内从事实践，不满足于只是对世界宣传社会主义。他从俄罗斯的虚荣心出发期待更大的结果，靠语言战和乱用“和平”、“自治”词语，想在德国也制造内乱。不过他不知道实际情况，德国军队至少有 2/3 是从农村征集的，还有 1/6 是从小市民阶层补充的，他们是乐于打击劳动者和其他的革命者的一切企图的。

不可能与偏执于信念者讲和，只能迫使他们不再为害。这就是布勒斯特最后通牒和强迫订约的

意义。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必须很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无论属于什么立场，至少从内面来看，我不知道有谁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6、目前状况下对革命的展望

社会主义者对革命及其结果的态度

与现今的社会主义者讨论时，面对今天的状态，我们本着诚实的态度（这也是唯一明智的对应），可以提出两个质问。第一，这些社会主义者是如何对待这个进化主义的根本教义的呢？他们的进化主义认为社会和它的经济秩序是严格地按照自然法则、即按阶段发展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充分成熟之前，社会主义社会在何处都不能出现，按照这种社会主义的见解来看现在何处也不成立，因为小农和小手工业者还存在。那么，对于今天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教义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结果是，这样至少在俄国之外，他们都立足于进化主义。即使连最过激的分子也不是期待无产阶级指导下的社会秩序而是期待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成立。因为无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时机在何处都没有成熟。他们期望这个社会秩序在某些特征方面离那最终成熟阶段只有两、三步之遥；从这里总有一天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秩序的转换。

孟什维克的立场

如果诉诸良心，每一个诚实的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都会这样回答。至少在俄国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存在着广泛的阶层，即孟什维克，它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那种匆忙从资本主义现实中嫁接出社会主义秩序的实践，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亵渎。这两派互相憎恶的原由就在于教义上的异端。

革命带来了什么？

至少我知道的所有的领导者都立足于这种进化主义。如果大多数领导者都如此认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在目前情况下，处于战争状态中，从他们的立场出发，革命到底能够干成什么呢？”

革命引起内战，伴随内战或许还能变成协商的胜利，但不会招来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可能在崩溃的国家里，产生农民及小市民结成的、强烈反对任何社会主义的相关利益的支配。更何况，由革命引起的巨大的资本的破坏和混乱又回到马克思主义提及的社会发展的螺旋的起点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提是以资本更加充满经济为前提的。

农民的保守性

还应该考虑到西欧的农民与习惯了生活在农业共产制下的俄国农民的不同性质。在俄国，土地

问题是决定性的，在德国却不成为问题。德国的农民，至少在今天也是个人主义者，他们执著于继承财产和土地。他们不愿意降低和改变这种执著心理。如果遭到威胁的话，他们更愿与地主同盟而不愿与激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

悲观的革命展望

由此，对社会主义将来的展望，在目前的战争状态下，即使革命有成功的可能，也会陷入最恶劣的状态。即使在革命最有可能有希望的场合，也只意味着政治体制将达到民主制度希望的形式。不过，这必将带来经济上的反动结果而远离社会主义，任何客观公正的社会主义者也无法否定这一点。

社会主义者与讲和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与讲和相关的。我们都知道，今天激进的社会主义与大众的和平主义倾向期待近期缔约讲和。很清楚的是，激进的、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必定正直地承认，社会主义领导者并不认为讲和是最关键的议题。

我们要问，可能的话，是再继续三年的战争而等待革命的发生呢？还是选择没有革命而立即讲和呢？一个性格朴实的人一定会说：当然还要进行三年的战争。他们这样干脆地说确实是基于自己的狂热信仰和良心的。在国外战斗的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军人，是难以与命令他们这样做的领导者意见相同的。而且，即使强制他们表明自己的立场，也是正当和常见的。

讲和还是革命

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不想讲和，我认识的社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持有异议。这对各国的激进的领导者也是合适的。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仍然不想讲和。如果战争可以引起革命即内战，他们就要战争。

再说一遍，按照他们的见解，即使革命不能带来社会主义，战争也有益于革命。他们希望战争会引导资产阶级社会向（接近社会主义的）更高级的形态发展；会比今天的社会更靠近将来的社会主义的到来，当然，由以上列举的理由看，这些希望本身就是很值得怀疑的。

与社会主义者的对立

与信念固执的社会主义者或革命家争论，总是困难的。从我的经验来说，他们从来不会被说服。只能要求他们面对自身的支持者明确：对讲和的态度、革命能带来什么、阶段进化问题的立场。后者至今为止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在俄国而被土生土长的派别所拒绝。它认为俄国可以越过西欧式的发展阶段，而且这是唯一有效而可能的道路。

社会主义与国民利益

我认为，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消除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希望。各种劳动者阶层常常会程度不同地回到社会主义。问题是从国家利益特别是目前的军事利害的观点来看，这种社会主义是否是能够接受的社会主义。

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统治，包括无产阶级统治（像巴黎公社或今天布尔什维克的统治那样），当其基础纪律受到威胁时，不动用军事法庭手段的。托洛茨基以令人吃惊的坦率承认了这一点。不过，只有当军人们感到军事法庭的判决只是基于维持纪律的客观的利害而不是为了阶级或政党的利益，军事法庭是战争期间不可避免的客观需要，才不会使军事的权威产生动摇。

注 1: Fontenoy 是比利时边境的一个小镇。1745 年，萨克森率领法兰西军队在此大败坎巴兰特公爵等率领的英国、荷兰、奥地利、汉诺威联军。

注 2: 德国没落贵族出身的军人。三十年战争中为德国皇帝菲尔得南立下战功而被封为伯爵，后来终被皇帝杀害。

注 3: 这是指古罗马的情况，下层市民隶属于上流贵族，在财产、工作方面得到庇护，同时也有效忠、从军等等的义务。

注 4: 中文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一种独裁。

注 5: 考茨基是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大理论家，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的领袖。他对俄国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一党独裁进行批判，被列宁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斥为叛徒。兴许列宁就落后农业国俄罗斯做出的一党独裁形式是不错的，考茨基鉴于德国的情况认为应该通过民主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也是对的。

注 6: 韦伯首先提起的“中间层”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极为普遍的事实。例如现在日本社会的“工薪阶层”，他们的主观意识都是“中流”，七十年代，日本曾经有 90% 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战后日本自民党的连续执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注 7: 米勒兰是法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家，1885 年作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被选为下院议员，1899 年成为商务大臣，在任职内新设劳动局扩充年金·劳务保险建立养老金制度等等。

2005 年 3 月修订于 San Jose